

和我的美国老师交往中的点滴

许斌*

从 1986 年开始，我在学习经济学上得到了美国老师的指导。那年我有幸参加了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美经济学培训项目，俗称“福特班”。这个项目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由邹至庄教授牵头办成的，程度相当于美国博士班第一年。我在这里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我们的微观经济学老师是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 Mark Machina 教授，留着大胡子，和照片中的马克思有几分相似。他曾得意地对全班说，在北京闲逛时有好几次享受了长时间的注目礼，翻译告诉他这是因为人们以为马克思来到中国了。马教授（Machina 中文名字马中国）数学功底深厚，在黑板上推导微观经济学定理挥洒自如。他在本科是学数学的。记得他曾讲到过他是如何改学经济学的。在他还是本科学生的某一天，他在书店里随手翻阅 Handerson 和 Quandt 所著的《微观经济学》，被其中精致的经济学数学模型所吸引，当即决定改换门庭。在我印象中马教授很有童趣，最喜欢和小个子的陈小红妹妹（现为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开玩笑。在期末考试前，马教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 100 美元，悬赏给考试的第一名。有趣的是他在计算考试成绩时出了一个小差错，将 100 美元奖给了第二名。后来他发现了错误，毅然拨乱反正，又拿出 100 美元奖给真正的第一名。马教授的专长是不确定性经济学（economics under uncertainty）。不过这次计算分数的“不确定性”让他付出了双倍的代价。

*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在福特班教我宏观经济学的是密西根大学的 Roger Gordon 教授。Gordon 教授是个儒雅君子，在公共财政学上有一流的造诣。如果说 Machina 的板书严谨到可以直接印成教材的话，那么 Gordon 上课的内容较为松散，但留下了更多的思考余地。Gordon 教授的太太 Michelle White 教授是法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在她的课上我们学到了许多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案例。Gordon 夫妇热爱我们这些学生，可以说是真情投入。在他们回美国后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将班上的优秀学生推介到北美深造。大概是因为我在 Gordon 教授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上得了一个 A+，所以给他留下了印象。我能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和 Gordon 夫妇的推荐是分不开的。2002 年夏天在香港为邹至庄教授举行了一个庆祝会议，会上 Gordon 教授回忆了他们夫妇在福特班的美好时光。有什么比看到昔日的学生成长为今日的学术同事更能令老师欣慰的呢？！顺便提一句，我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认识了小洪兄，开始了和《经济学家茶座》的缘分。

在人大福特班结业后我回到复旦大学完成硕士学业。由于人大班的成功使福特基金会扩大了对这个项目的资助，在复旦大学开设了第二个福特班。1988 年夏天复旦福特班举办了以国际经济学为专题的暑期研讨班，我承担了助教工作。研讨班由 Jeffrey Frankel 讲国际金融，Ronald Findlay 讲贸易理论，Robert Baldwin 讲贸易政策，Jonathon Eaton 讲国际投资，阵容可谓强大。当时我为 Frankel 和 Eaton 做助教，也听了 Findlay 和 Baldwin 的讲课，领略了他们各自独特的教学风格。Frankel 的讲课太有条理了，可谓滴水不漏，超过了前文提到的

Machina 教授。Findlay 喜欢拿一支粉笔，边讲边在黑板上写下式子，沉浸在自己的推导中。Eaton 的讲课跳跃性强，学生很难跟上他的思维。我当时对他们的讲课一知半解，也没有去仔细研读作为参考书的 Krugman 和 Obstfeld 的《国际经济学》（好像是第一版），回想起来是错过了一次极好的深入学习国际经济学的机会。当时我受 Gordon 教授的影响，喜欢的是宏观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在复旦作为硕士生的我被委予了讲授宏观经济学这门必修课的重任；而对公共经济学的浓厚兴趣让我参与翻译了阿特金林和斯蒂格里茨的研究生教材《公共经济学教程》（上海三联书店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我在复旦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经济效率的国际比较。

1990 年我开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后来师从 Ronald Findlay。虽然 Findlay 教授在 1988 年夏天来福特班暑期研讨会时我见过他，但我没有为他当助教，只是旁听了他的讲课。我申请哥大倒不是冲着 Findlay 教授或者国际经济学而去的，也不是冲着纽约而去的。当时读了一本翻译过来的书，书名记不得了，是一个美国记者采访四所著名大学经济学博士生探讨各个经济学流派在校园中影响力的那么一本书，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这本书对我当时申请什么学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那时很向往明尼苏达大学，因为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在那里很活跃，是当时的学术前沿，可惜该校没有给我奖学金。而我在申请材料个人短文中对公共经济学所表达的热情显然打动了哥大经济系负责招生的 O'Flaherty 教授，一位研究城市经济学和贫困经济学的左派教授。在哥大学习了一年以后我意识到了

国际经济学在这里的雄厚实力，而宏观经济学的高深教学让我望而生畏（当时我的宏观老师是 **Ricardo Caballero**，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不久。现在他回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国际经济学作为第一专业。当时哥大的国际经济学专业一般由 **Findlay** 讲国际贸易理论，**Bhagwati** 讲国际贸易政策。我在第二年上专业课时，**Findlay** 教授正好休学术假，所以两门课都由 **Bhagwati** 来上。**Bhagwati** 上课挺有意思，很兴奋，喜欢聊一些趣闻轶事。他显然不太喜欢 **Krugman** 等倡导的“新国际贸易学”，在一学期的课程中只放了一节课，而且并不怎么讲该理论的模型，只是列出了 **Krugman** 和 **Helpman** 的书让我们自己去读。那年哥大邀请了 **Krugman** 和 **Bhagwati** 同台讨论国际贸易问题。记得 **Bhagwati** 很兴奋地对我们说，明天去听他和 **Krugman** 的辩论。但第二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调亢奋的 **Bhagwati** 和一个低调含蓄的 **Krugman**，没有擦出任何火花，让我们很是失望。实际上 **Bhagwati** 虽然不认同“新国际贸易学”，但对自己是 **Krugman** 的老师一直很骄傲。当年 **Krugman** 的“新国际贸易学”的开山之作在投稿时到处碰壁，是 **Bhagwati** 力排众议将它刊登在《国际经济学杂志》上。那时 **Bhagwati** 是该杂志的主编。

我在哥大的第三年 **Findlay** 教授休假归来。当时我们班三位印度同学都选择 **Bhagwati** 做论文导师。尽管 **Bhagwati** 教授明确欢迎我当他的学生，还就论文研究方向给了我具体的建议，但我还是决定不去和我的印度同学“争宠”。于是我敲开了 **Findlay** 教授的办公室。话题自然从 1988 年夏天 **Findlay** 教授在复旦福特班的讲课开始。提到那次

访问，Findlay 教授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我和教授谈了一些我的研究想法。对于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Findlay 教授满口答应。那年 Findlay 教授为我后面一届博士生上国际贸易理论课时，我去旁听了一遍，算是徒弟正式拜入师门。

我博士论文想研究的是金融中介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型中，资本市场被假定是完善的，所以金融中介没有任何作用。我当时设想是不是可以将金融中介的模型嫁接到国际贸易模型中得到一些新的结论。Findlay 教授对我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采取了鼓励态度，并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刚出版的关于信息不对称下决策模型的书借给我翻阅。在我认识的经济学家中，Findlay 教授可以说是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在他的家中满是书架，放置着大量的书籍特别是历史书籍，家中的装饰镜框中放的是一幅幅古代的地图。今天回想起来，Findlay 教授当时应该并不认同我的选题。但作为导师不去限制学生的想象力，想来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在我开始博士论文研究时，Dani Rodrik 教授加入了哥大经济系。他的到来为传统的哥大经济系带来了一阵新风。Rodrik 教授的思想从不落俗套，甚至有时称得上“异端”。他开设的发展经济学课程非常受欢迎。虽然我已不需要额外学分，但我还是注册了这门课，目的是用考试来激励自己花更多时间在这门课程上。我从 Rodrik 教授的讲课中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通过这门课和教授建立起了师生关系，可以去求教博士论文写作时的问题。受 Rodrik 教授的影响，我的论文研究重点转向了政策方面。我完成的第一篇文章讨论了在金融

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对幼稚产业的贸易保护是否符合社会福利。在我构建的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看似可以通过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来克服由金融市场不完善导致的建立幼稚产业的融资瓶颈，而实际上这个政策会损害社会福利。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学理论文章“胜在出乎意料”的审美倾向，因而颇得 Rodrik 教授的赞赏。那段时间论文写得很辛苦。Rodrik 教授大概看出了我的疲劳，对我说你应该去 take a vacation。说来有趣，当时作为中国穷学生的我虽然已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但对旅游和度假两者之间的区别没有概念。Rodrik 教授应该是将生活中需要度假这个概念注入我头脑中的第一人。现在我在度假时偶尔会想到 Rodrik 教授当年对我的这番教导。

我在哥大当学生时最风光的一天莫过于在系里正式演讲我的 job market paper，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在美国念书很少有机会西装革履，我那天的形象肯定让 Findlay 教授非常 amazed，我从他的眼神和笑容中可以看出。那天来了三十多人，有七八位教授。演讲进行得很顺利，我的论文得到了肯定。记得 Robert Mundell 教授也参加了会议并提了一个问题，在我回答他的问题后 Findlay 教授帮我作了一些补充。那天晚上 Findlay 教授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我应该如何在这篇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作了很详细的指导。Findlay 教授肯定了这篇政策导向的论文，但希望我将金融市场模型更一般化地引入到新古典贸易模型的框架中，来推导关于贸易类型和收入分配的相关定理。之后我在这方面作了努力，形成了包括近十个方程式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记得 Findlay 教授把我叫到他的系主任

办公室（在我毕业前那年他开始担任系主任），让我在黑板上演示这个模型，并给了我不少评论。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水平太低，对导师的评论中传递出的灵感只捕捉到一小部分，但已是受益非浅。Findlay 教授特别让我去找 Mundell 教授讨教。他举起双手在头顶上做了一个比划，意思是 Mundell 教授的头脑中充满了智慧的火花。我遵嘱去找 Mundell 教授，但几次没有找到也就作罢了，现在想来有点遗憾。Bhagwati 教授那天没有参加我的论文演讲会，但从他的学生那里知道了我的演讲情况，其后遇到我时多有赞扬和勉励之言。Bhagwati 很重师生关系。有一次我去向他讨教时，他指着办公桌的一角，我吃惊地发现了一张我和太太的照片，那是上一次我们拜访他时送给他的。难怪 Bhagwati 教授桌上放着那么多的东西！

原来打算浅写即止，但笔停不下来，拉拉扯扯写了这么多，还是就此打住吧。和我的美国老师们的交往只记录了一个开头，他们对我的帮助一直在延续着。在写这些文字时，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崇敬和感激。当年看似平淡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格外珍贵。生活的美好不正是蕴含在这点点滴滴之中吗！